

中非交往：风风雨雨50年

陶短房

如果说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后中非政治经济的交流，是从“交朋友”到“做生意”，开始懂得赚钱重要性的过程，那么近些年来则正经历着从“做生意”到“交朋友”的转变，开始重新认识非洲的价值。



重返非洲

中非之间的交流可上溯到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代，据记载，公元前 1 世纪，埃及末代法老、女皇克娄佩特拉的御衣所用材料，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和非洲北部打通了直接陆路交通，经济交流更形频繁。到了唐代，不光中国瓷器、钱币大量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各地，有关中国的典籍开始出现在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和大学，中国人的足迹也首次踏上非洲大地。及至宋、元，中国航海业更加发达，中国货物不但遍及非洲沿海，甚至深入津巴布韦等非洲腹地。15 世纪初，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的船队曾 3 次驶抵非洲东海岸，访问了马林迪等今天肯尼亚、索马里一带多个非洲港口，还有一些中国水手在非洲定居。今天索马里北部仍有“郑和屯”地名，去年中国举办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时，便有肯尼亚少女根据家族流传的口碑前来认祖，声称自己是郑和水手的后裔。

然而，就在郑和下西洋半个世纪后，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非洲，而中国却因专制王朝“片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导致中非之间的传统交往被生生割断。到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广阔的非洲大地上只剩下埃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 3 个独立国家。就在这期间，大批华工还被西方殖民者运到非洲从事修路、开矿等艰苦劳动。这种命运是相通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改良和民

主革命人士关注、同情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并以非洲被列强瓜分的前鉴警醒中国人，不自强就意味着被弱肉强食，中国人把非洲的解放事业和自身联系在一起看待，实际上是萌发于此的。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中非关系翻开全新的一页。

■ 四季皆是夏，一雨便成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主观上将依附于西方的一些非洲国家当作帝国主义阵营一员，客观上北京在联合国没有席位，使非洲国家产生种种疑虑，影响了双方的接触和交往，直到万隆会议召开，这块坚冰才逐渐融化。1955 年，周恩来总理在参加印尼万隆会议途中在缅甸停留，亲自到仰光机场迎接了随后抵达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并一同下榻于缅甸总统府内，开始建交谈判。这一谈就谈出了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埃及，时间是 1956 年 5 月 30 日。

此后短短数年间，通过大力赞助阿尔及利亚、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这些地区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纷纷独立后，形成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据统计，1955~1965 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为 22 个，除法国外，均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其中几内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黑非洲国

家。1960 年 4 月 12 日，中国政府成立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这也是迄今唯一一个以大洲为单位的中外友协组织。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历史性地出访非洲 10 国，开创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一次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记录，这一记录直到 20 年后才被打破。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非关系五原则和中国外援八原则，其中承诺：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而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其中仿苏联 AK-47 所制的 56 式冲锋枪，在非洲一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标志，以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的国旗上都绘有这种枪的图样。中国还培训了大批“自由战士”，其中 5 人独立后成为总统。

中国在非洲的强力作为，既支援了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也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态势。但该阶段同样存在隐患，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按其对待美帝国主义及原宗主国的态度、关系划分为左、中、右，无形中丧失了许多本可开拓的政治空间。

60 年代中，中国国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冲击非洲，在一些国家的使馆，出现了“造反派”夺权的现象，个别使馆甚至在正式外交礼仪场合出现大使、参赞当服务员、“造反派”发号施令的怪相，一些使馆强行在当地发放“红



▲1963年，周恩来、陈毅在埃及开罗与埃及领导人合影。

宝书”，不顾国情、民俗地鼓励工人罢工、妇女“翻身”、基层群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在非洲各国引起了强烈反感和巨大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华声浪，另一些国家领导人则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质疑。虽然在多方努力下，这种混乱现象很快得到纠正，但所造成的阴影却并非旬日可以消除。

70年代初，北京为摆脱两面受敌的政治困境，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原则，此时苏联出于冷战考虑，在非洲安哥拉、扎伊尔、索马里等地先后挑起战端，严重威胁非洲各国的稳定与安全，出于共同的利益，中非政治关系再趋密切。整个7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多达25个。但这一阶段中国存在“以苏划线”倾向，根据不同国家、派别和组织对苏联的立场来决定对它们的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使非洲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十分为难，而且减少了我国外交的回旋余地，更让中国在复杂多变的非洲政治格局中不时陷入尴尬，如对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态度前倨后恭，并非由于其立场的变化，而仅仅出于自身“划线”原则的

改变，使一些非洲国家和人士感到很难理解和适应。

“文革”后的中国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当中，外交变得更理性、更务实，对非洲国家也从过去的“战友关系”演变为正常的国与国交往，对于这种变化，许多非洲国家一时难以接受，与该阶段中国和欧美的密切往来相比，中非关系显得波澜不兴。

1989年的风波使中国再次陷入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中，也使得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总结、反思与非洲关系的重要性，对非洲投入更多注意力。自这一年起，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1989年后访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和第一位外交部长均来自非洲，而中国历届领导人也都出访过非洲。影响较大的有江泽民1996年出访非洲6国和胡锦涛2004年访问非洲。

纵观中非政治交往50年历史，“联合国席位”和“一个中国问题”是永恒的主题词。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投票中，非洲国家的赞同票（26票）占全部赞同票（76票）的1/3，毛泽东主席曾

形象地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此后台湾问题成为中非政治交往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屡次得失均与之有关。今年8月6日，中国和乍得复交，使祖国大陆和台湾的非洲“邦交国”数目之比定格为48：5。

从交朋友到做生意

与政治交往相仿，中非经济交流以万隆会议召开和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为节点，可明显分为3个阶段。

万隆会议前，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早已展开，并且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外交战略考虑，如1953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虽然中国当时并不急需棉花，但为了打通与埃及的关系，仍作出了购买的决定。这一阶段，由于非洲无一国与中国建交，加上双边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and 了解，中非贸易增长缓慢，1950年双边贸易额为1200万美元，至1955年为3474万美元。

万隆会议后，由于中国对非洲各国

反殖斗争的大力支持和这一阶段对非外交的高度重视，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至1965年达到2.5亿美元。“文革”的开始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中非经贸往来虽仍保持，却增长乏力，自1965年至改革开放初，双边贸易额不增反降，交易主要集中在茶叶、纺织品等传统产品的官方合同上。

80年代中国改革效应初显后，中非贸易额以年均3.6%的速度增长，2001年以来增长率更高达55%，为各地区同比之最；至2005年，更高达397.4亿美元，是50年前的800多倍，2006年一季度达115.4亿美元，同比增长52%。催生这种爆发式增长的，是双方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产品类型、贸易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贸易区域和贸易伙伴的不断扩大；其所依托的，是市场机制与外贸体制改革催化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

谈到中非经济关系就不能回避“援助”问题。中国对非援助始于1956年，大规模展开则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非但未停滞，反倒进入高潮，几个著名的大项目，如坦赞铁路、几内亚金康水电站和刚果布昂扎水电站等重大工程都是在70年代建成的，其中全长1876公里的坦赞铁路建成于中国最困难的1968~1976年。这种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无私援助”不符合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所无法长期支持的，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片面从政治出发，“划线”、逼站队，使许多受援国左右为难，影响了援助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反思对非援助摊子大、花钱多、效益差的局面，原先“无私合作”的理念被“互利合作”的务实态度所取代。截至2005年，中国共向非洲49个国家提供了近90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但一些非洲国家却认为中国不再慷慨，甚至说“中国得到的西方援助越来越多，给非洲的钱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加之冷战后西方对非洲的重新重视和投入，以及台湾的金元外交，一度给中国在非影响力造成相当压力。但随

着中国在非投资的增加，看得见的好处日益明显，加之在债务减免方面，中国已豁免非洲31国、105亿人民币债务，并给予29个非洲最贫困国家的190个税目商品以免税待遇，这方面的压力逐渐减轻。

自1999年7月中国首个海外大型油田在苏丹投产，仅4年工夫，苏丹便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份额油来源国。中国目前与利比亚、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有正式油矿合作项目，而拥有的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更涵盖了从西非的加蓬到东非的肯尼亚，从内陆国尼日尔到战乱初熄的民主刚果等许多国家，使非洲成为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地区。此外，中国对加蓬铁矿、赞比亚铜矿，以及铝、铀等战略资源开发的投入也初见成效。

除了商务往来，中非民间往来和旅游关系也呈升温状态，据公安部边检局统计数据，中国公民2005年因私出境赴非洲人员有11万，比前一年增长一倍以上。目前已有16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的旅行目的地，其中东非的肯尼亚成为“中国热”最先抵达的地区——非洲首座孔子学院和首个中国官方的调频广播，都是诞生在肯尼亚这块旅游胜地。

如果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后中非政治经济的交流，是从“交朋友”到“做生意”，开始懂得赚钱重要性的过程，那么近些年来则正经历着从“做生意”到“交朋友”的转变，开始重新认识非洲的价值。

十字路口宜思量

50年一路走来，不再满怀激烈，可也不再遭人误解；不再标榜道德，可也不再附庸他国。中国，回归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为了新的出发而开始系统的反思。

在外交上，中国已基本摆脱了“划线站队”的窠臼，显得更为务实、理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灵活性与前瞻性不够的问题，如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重表态，轻实质，给了一些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可乘之机，让一些国家得以在海峡两岸间反复“跳槽”；在

双边交流上，重视上层交流，而对民间、行业间交流和感情培养重视不够，和西方各国相比更是差距明显；在文化交流上，缺乏对当地文化需求的细致了解，如非洲各国汉语热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对华商业的迅速升温，商业汉语需求极为强烈，而中国在非的汉语教学，却仍以普通文化普及性质为主，严重落后于需求。

再说经贸领域，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能源、矿产勘测开发上投入巨大，对非洲工业品出口增长迅速，投资和工程建设也呈上升趋势，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但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中国企业缺乏对当地复杂民情的了解和分析，往往事倍功半；在产品输出方面往往片面强调经济效益，陷入低价倾销、以次充好、冲击当地工商业、损害当地人利益的怪圈；在投资和工程项目上往往单纯从管理和效率出发，大量使用中国劳工，而不愿给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对待当地雇员上，往往沿用国内管理模式，从而有意无意违反当地劳动法规，侵犯当地劳动者权益，这些都不同程度损害着中国在非洲的声誉。

和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在非洲终究还是一个后来者。前者的殖民原罪和苛刻援助方式固然令非洲人不快，但客观上为非洲提供了较完善的现代行政和司法体系，其严格监管的援助往往更有效、更具针对性。而中国虽然在反帝、反殖史上帮助过非洲，并培养了与非洲第一代领导人的深厚友谊，但时光荏苒，当年的老朋友如今仍在任的，仅剩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福利卡一人（独立时的外交部长）；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效仿苏联、中国，走公有化、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普遍较慢，以至今日非洲各国大多转而采用多党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各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羡慕，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敬佩，但缺乏五六十年代“以中国为榜样”的热情，双边关系，亟待探求新的共同基点。对于这个共同基点的发掘，应当成为本届中非峰会的主题，成为中非交往史上的里程碑。■

